

从“动物园”到“丛林” ——《白老虎》中的空间书写

王海燕, 黄洁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苏州 215006)

摘要: 2008年的布克奖获奖小说《白老虎》通过展现印度底层民众面临的生存困境, 探讨了城市化和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的空间非正义问题。从亨利·列斐伏尔和大卫·哈维的空间理论出发, 从三个层面对小说中的空间书写展开研究: 通过并置乡村和城市的空间图景, 追溯乡村被乌托邦化的历史, 与现实中乡村被边缘化的地位形成对照; 聚焦空间生产和空间重组过程中出现的“不平衡地理”和“空间区隔”现象, 通过私人空间的掠夺、公共空间的分隔、空间性资源的侵占呈现底层民众遭受空间性剥削的逻辑和本质; 纵观全球资本的空间布局, 揭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实行资源垄断和推行文化霸权的本质。阿拉文德的空间书写不仅揭示了资本全球扩张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 更表达了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和对空间正义的呼唤。

关键词: 《白老虎》; 阿迪加·阿拉文德; 空间生产; 空间书写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5)06-0549-07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31021504

From “Zoo” to “Jungle”: Spatial Writing in *The White Tiger*

WANG Haiyan, HUANG Ji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Abstract: Depicting the plights of the underprivileged in India, the 2008 Booker Prize-winning novel *The White Tiger* explores spatial injustice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Based on Henri Lefebvre and David Harvey's theories of spatial production and spatial justic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novel's spatial writing in three dimensions. It juxtaposes rural and urban landscapes to contrast utopian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in history and margin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in reality; it focuses on “uneven geographies” and “spatial segregations” during the processes of spatial production and reconfiguration, and reveals the logic and essence of spatial exploitation of the poor through appropriation of private spaces, division of public spaces, and encroachment on spatial resources; it displays the global and capital configuration, and unmasks the nature of resource monopoly and cultural hegemony practiced by capitalist nations. In short, Aravind's spatial writing not only addresses some social issues brought about by the global capital expansion, but also conveys a profound sympathy for underprivileged people and appeals for spatial justice.

收稿日期: 2023-10-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9FWWB028); 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项目

第一作者: 王海燕, 女,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澳大利亚文学。E-mail: wanghaiyan2025@163.com

通信作者: 黄洁, 女, 副教授。研究方向: 澳大利亚文学、20世纪英语女性文学。E-mail: hj720@qq.com

Keywords: *The White Tiger*; Adiga Aravind; spatial production; spatial writing

印度作家阿迪加·阿拉文德(Adiga Aravind)于2008年凭借小说《白老虎》(*The White Tiger*)斩获布克奖。作为一名生于印度、长于澳洲、学于英美的记者型作家,阿拉文德丰富的人生经历滋养了他持续的创作灵感。《白老虎》讲述了一位印度乡村青年如何在命运的裹挟下,被迫进城谋生,被城市污染了灵魂,最终弑主夺财的故事。罗比·高(Robbie B. H. Goh)认为《白老虎》中提及的“黑暗印度”是难以解决的暴力和社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印度社会独特的文化或在全球同质化和去领土化背景下维系文化身份的手段^[1]。莉娜·科尔(Lena Khor)以斯皮瓦克的“属下”理论解读小说,认为主人公巴尔拉姆代表的“属下”阶层纠正了作为后殖民国家的印度在发展中的错误和阶级不平等,并打破了根据富人道德运行的人权预设^[2]。国内学者姜礼福试图从后殖民生态视角解读小说,探究了动物园和动物意象镶嵌于寓言叙事和戏剧叙事中所反映的反殖民思想和生态意识^[3]。黄芝认为小说通过构建叙事人的“自白叙事”,启发读者进行伦理判断并洞察伦理问题背后的社会等级制度、畸形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政府腐败等当代印度社会弊病^[4]。这些研究多从意象隐喻、后殖民理论等角度探究小说传达的社会问题,却鲜少有研究从空间视角考察小说中的非正义是如何在空间层面上形成和运作的。

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指出,“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城市结构及其沟通的多重网络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城市及其各种设施是资本的一部分”^{[5]49}。空间生产凭借其强大的资本逻辑,不仅改造了社会关系,更改变了人的生存环境。资本主义模式下的空间生产固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实质上仍是一种空间性的资源掠夺。资本逻辑下的空间生产和空间重组进一步剥削了底层人民,并压榨了其剩余价值,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加深。因此,“面对资本主义大规模的空间生产和空间重组,对空间意识形态的批判成为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6]50}。本文试图借助列斐伏尔及其思想的集大成者大卫·哈维

(Harvey David)的空间生产与空间正义相关理论探究《白老虎》中空间生产的文学表征,剖析底层人民生存空间被压榨的悲惨境遇,揭示资本主义模式下空间生产和空间重组的非正义性及其逻辑,体现阿拉文德对底层民众遭遇的同情以及对空间正义的呼唤。

一、被边缘化和乌托邦化的乡村空间

雷蒙·威廉斯(Williams Raymond)在《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中提到:“对于乡村,人们认为那是自然的生活方式,代表宁静、纯真的美德。对于城市,人们认为那是成就的中心,代表智力、知识。”^[7]小说中的城市与乡村作为“中心”与“边缘”、“堕落”与“纯真”的对立空间出现。城市在空间重组的非正义逻辑下,凭借自身的资本优势,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蚕食乡村空间,成为“中心”并使乡村空间的地位日趋边缘化。印度作为世界第二大农业生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印度,土地分配不均的情况却十分严重,“农村中75%以上的贫苦农民仅占有耕地的四分之一,而2%的富农占有的耕地却占到总耕地的五分之一”^[8]。这就导致农民的生存空间和剩余价值被盘踞在乡村的地主阶级不断剥削。小说中的拉克斯曼加尔村的四个大地主——大水牛、鸮鸟、野猪和乌鸦分别对人力车夫、渔夫、农民和羊倌们极尽剥削之能事,“盘剥着村民的每一分钱,压榨着村子的每一滴油水”^{[9]24}。大地主阶级通过收租、收份子钱等名目各异的由头大量剥削农民的收入,而生活在乡村的底层民众同时还受到腐败的政治制度、封建种姓制度和嫁娶制度的压迫。根据印度的种姓制度,巴尔拉姆的种姓“哈尔维”是“做糖果的人”^{[9]56},所以巴尔拉姆“总是去糖果店打工”^{[9]56}。种姓是印度教价值取向在社会群体中的分隔符号,造成身份和权力的阶序性固化。洁净或不洁的宗教意识是种姓划分的核心,体现为价值分化和等级固化,导致社会结构分化和种姓之间的隔离与对立。作者借主人公巴尔拉姆之口对数千年的种姓制度提出了质疑:“我父亲原来一

定真的是哈尔维,是个做糖果的,但当他继承了糖果店后,肯定有别的种姓的人在警察的帮助下把店子给抢走了。”^{[9]57}不仅如此,曾经等级森严的“动物园法则”也在英国撤出印度时被“丛林法则”^{[9]62}取代了。巴尔拉姆进入城市后发现种姓制度并不具有绝对约束力,“城市里的人一点也不了解种姓制度”^{[9]57}。在考虑是否雇佣巴尔拉姆时,鹤鸟认为“我们雇的下人都是高贵种姓的。不过有一两个低贱种姓的也无妨”^{[9]57}。作为大地主的鹤鸟依靠剥削农民的收入积累财富,却对在乡村地区大行其道的种姓制度知之甚少,只知道种姓有高贵低贱之分。可见仆人的种姓只是雇主炫耀身份和地位的手段,而非决定是否雇佣的绝对标准。当生活在乡村地区的巴尔拉姆想要学习开车时,也被以“你们这个姓的人是专门做糖的”、“穆斯林、拉其普特人、锡克人,他们才有斗士的血脉,他们才有资格做司机”^{[9]50}为由遭到拒绝。持续千年的封建种姓制度在乡村地区大行其道,将所有人禁锢在既定的职业和命运中。大地主阶级通过政治手段不断掠夺底层人民的既有产业,农民受制于种姓制度的职业要求,无产的农民只能被迫滑向更低的阶层,成为人力车夫等纯粹以出卖劳力为生的无产者。农村地区的无业男性越来越多,他们出于生计考虑,只能“前往德里、加尔各答或者丹巴德去找份工作糊口”^{[9]24},他们被迫加入城市化浪潮,成为城市化建设中所需的廉价劳动力。

种姓制度不仅在职业层面上限制底层民众,更通过婚嫁制度继续蚕食底层民众的财富。“不同的种姓和不同的社会阶层密切相关……高种姓女性与低种姓男性通婚会使自己和孩子都被逐出家族,成为种姓制度之外的贱民。因此,为使家中女性免遭厄运,女方家庭在成婚前往往要向男方家庭提供大笔嫁妆。”^[10]巴尔拉姆本来在拉克斯曼加尔乡村小学读书,虽然设施简陋,教学质量堪忧,但巴尔拉姆生性聪颖,在突击教育检查中大放异彩,被督导夸奖“是一只白老虎”^{[9]32}。督导甚至许诺为他申请奖学金,使其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此时,巴尔拉姆的堂姐莉娜要结婚,因为是女方家,婚前“被狠狠地敲了一笔”^{[9]33},还要“筹办堂姐铺张的婚礼和不菲的嫁妆”^{[9]34},巴尔拉姆家无力承担巨额的花费,只得向地主鹤鸟借高利贷,家人还不上债便将年幼的巴尔拉姆

交到茶馆打工抵债。乡村地区大量男性背井离乡使得这里印度女家长式的伦理结构盛行,因此即使巴尔拉姆的父母为大家族勤恳付出,甚至做出牺牲,他们在家中也只能服从拥有最高决定权的祖母。无论是家庭成员赚了钱都要全部如数上交,还是让巴尔拉姆为酒驾撞人的雇主入狱顶罪,抑或是迫使巴尔拉姆结婚以敲诈女方嫁妆并加强对他的控制,乡村女家长的决定都是以家族利益为先,全然不顾个人意愿。

威廉斯指出文人们将乡村生活浪漫化为乌托邦式“秩序井然的往日时光”,代表“田园式的纯真”和“自然”;与之相对,城市代表堕落、贪婪和“世俗”^{[7]44}。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阿肖克生活西化,只喝进口威士忌,说英文,坚持素食主义。比起他的父兄,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他从表面上看更懂得人文主义关怀,会关心自己的仆人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状况,对印度国内政府贪污受贿的行为表示强烈的不满。但“天真无邪”的他回印度后的生活处处碰壁。维查直白地评价他说:“这家伙去过美国,脑子里装满了狗屎。”^{[9]245}在异国和大城市都无法找到归属感时,阿肖克先生想回到拉克斯曼加尔村看看,他说“那是我祖辈生活过的村子”^{[9]73}。作为城市人,阿肖克将乡村浪漫化为“纯真、自然、道德”的场所。仆人巴尔拉姆只是用手指摸了一下眼睛,阿肖克却认为这是因为刚刚经过一座寺庙,“黑暗之地的村民”“虔诚”地“摸摸眼睛,以示尊重”^{[9]82}。他这种对乡村居民自以为是的揣度和判断,体现的是傲慢的城市有产者对乡村生活进行肆意浪漫化、乌托邦化的倾向。

印度评论家索马克·戈沙尔(Somak Ghoshal)认为:“对于潜伏在这个拥有十亿人口国家的隐秘的小说家而言,写黑暗印度,即远离印度繁华大城市的农村腹地,是最好的选择。”^[11]阿拉文德认为:“印度是由两面矛盾体组成的:一面是光明,一面是黑暗。”^{[9]13}所谓“黑暗之地”主要集中在乡村,经济落后,发展停滞,封建保守,就连最受膜拜的神明也是“猴神哈努曼”,因为“他是罗摩大神最忠实的仆人”,并且“以绝对的忠诚热爱与奉献侍奉自己的主人”^{[9]18}。换言之,生活在被边缘化的乡村空间的人就连梦想也应是侍奉别人。“黑暗之地”的生活充斥着无法逃离的绝望,就像贯穿全文的“鸡笼”。底层民众任

人宰割,无力反抗,只有成为“白老虎”,只有逃离乡村,才能获得一线生机。

二、城市空间非正义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下,资本不断地向空间拓展,空间被资本化,成为资本的转化形式。哈维在描写19世纪的巴黎时指出:“巴黎房地产越来越被视为是纯粹的金融资产、虚拟的资本形式,其交换价值被整合到资本流通中,完全支配其使用价值。”^[12]资本的权力与力量转移至空间,导致飙升的土地价格背后隐藏着不容忽视的社会意义。哈维指出:“巴黎土地享有相对稳健的高报酬率,土地价格也不断飙升。同时巴黎的房地产所有权具有的社会意义出现剧烈变化。”^[13]¹³⁵因此,空间成为财富的标志,空间资源占有体现了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资本主义逻辑下的空间生产和空间重组追求利益最大化,通过剥削和掠夺底层的生存空间,不断扩展资本的生产空间,最大限度地获得空间生产中的剩余价值。巴尔拉姆起初在茶馆打工时和哥哥基尚一起“睡在丹巴德的马路上”^[9]⁶⁰,成为二号司机后睡在仆人房中一号司机拉姆“床下的地板上”,击败拉姆成为一号司机并跟随雇主阿肖克先生去到新德里后成功入住仆人区的空房间。虽然这个房间“地板还没有铺好,墙上刷着廉价的白色灰泥,上面还留有工人的手印”^[9]¹¹⁶。仆人房的位置也很特别,“在印度,任何一幢公寓楼、任何一套房子、任何一个旅馆都建有仆人专用的住处,有的建在后面,有的像白金汉塔楼B座那样建在地下”^[9]¹¹³。仆人房完全是按照主人的需求建造的,仆人在这里只能休息、睡觉和等待主人命令,除了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外,仆人房没有任何多余空间,也不提供任何功能性设施。代表资产阶级的主人群体虽然人数很少,却住在宽敞的庄园或高级公寓中,霸占大量的空间和资源;被剥削和压迫的仆人虽然人数众多,却只能挤在地下室的仆人房中,几乎不占有多少空间资源。而更多来自“黑暗之地”的穷人在进入大城市后只能“像动物一样住在大桥或者立交桥下面”^[9]¹⁰⁶。乡村居民为了生计来到城市,最大的追求也只是像巴尔拉姆一样在仆人房中占有一席之地。居住空间无疑是人类最基本的空间需求。然而,在高速城市化的印度只有极

少部分的资产阶级拥有充足的居住空间,大量的穷人,尤其是来自乡村的无产者,既失去了自己原本在乡村的资产和空间,又没有能力在贫富两极分化的城市中获得生存空间,从此彻底沦为空间的难民。此时,空间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也是奴役人的工具。

空间生产不仅致力于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空间重组使得财富以更加不平衡的方式被重新分配。哈维指出:“房地产开发……是一种有利手段,将大量财富积聚到少数人手里。由于农民并不拥有土地,很容易就一无所有,他们的土地转而成为城市牟利所用,劳动者在农村无计谋生,被迫离开土地加入劳动力市场。”^[14]¹⁶⁹拉克斯曼加尔村的四个大地主在当地占有大部分土地、河流甚至道路,极尽可能地剥削当地村民,“被榨干的村民只有到外地去讨生活”^[9]²⁴。村子里的男人们会聚在茶铺外面等巴士,争抢着挤上公交车和火车“前往德里、加尔各答或者丹巴德去找份工作糊口”^[9]²⁴。传统婚嫁制度和种姓制度加深了对农民资源的压榨和剥削。正如“哈尔维”是“做糖果的人”,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农民都是从事工匠手艺或者服务类工作的低种姓。当被掠夺了资产后,受限于种姓制度,村民们无法在当地找到工作。为此,他们只得争先恐后地进入城市,成为富人家的厨师、司机、保姆、工地工人、商场保安等,以赚取微薄的报酬,养活乡下的一家老小。像巴尔拉姆这样生活在大城市周边乡村的农民,看似是主动选择进城,实则是被迫卷入城市化进程,其本质是“资本运行逻辑之下占据了绝对优势的资产阶级利用城乡差别对农村和城市新移民的掠夺和剥削,以实现资本积累和增值”^[15]。该进程是一个社会财富的重新调整和分配的过程。对资产阶级来说,城市化是财富的积累过程;但对广大劳动者来说,城市化却是贫困的加剧过程。城市中聚敛的财富以极其不平衡的方式源源不断地流向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与此同时,城市贫民数量在不断增加,并固化为城市中几乎永久性的下层阶级。

资本主义主导的城市空间重构成空间呈现出层级化和碎片化的趋势,公共空间被不断侵蚀,逐渐趋于私有化和隔离化。城市中的居住空间呈现出高档住宅、平民社区、贫民窟等等级森严的空间结构。小说中阿肖克先生住的白金汉塔楼公

寓、巴尔拉姆住的地下室仆人房和建筑工人临时搭建的棚户区就是印度在城市化进程中社区空间重组的结果。资本对城市进程中的空间资源的不平衡分配加剧了城市居住空间的等级化,凸显了空间非正义问题。哈维指出:“社会阶级的区隔,既以空间生态的方式存在,又以垂直隔离的方式呈现。”^{[13]46}人们被空间隔离开来,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空间资源的占有与社会身份的建立之间形成内在关联:空间隔离造成社会身份分化,空间的分割过程就是社会身份的形成过程。哈维曾提出“不平衡地理”的概念:以巴尔的摩市为例,好学校和好医院只对富人开放,穷人只能就读于二流学校或者就诊于普通医院。这就导致穷人获得良好教育和医疗资源的机会在空间地理层面被严格限制。“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机构掩盖了长期的贫穷和社会不平等,那些机构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是不可及的。”^{[16]33}巴尔拉姆作为人力车夫的儿子,在拉克斯曼加尔读书时经历过学生的免费午餐和制服被老师贪污的事,因为半年没发薪水,老师采用“甘地式抗议方式讨薪,那就是一天不发工资,他就一天不做事”^{[9]30}。即使是环境如此恶劣的教育机会也被大地主以高利贷为手段给剥夺了。而身为大地主鸫鸟的儿子,阿肖克先生有机会去美国接受西式教育。留学归来后,他和美国妻子平姬夫人总是用英语交流,还对巴尔拉姆的英文发音加以取笑。可见,当穷人连最基本的受教育权都无法保障时,富人却在教育上不断攀比,并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同样的状态也发生在医疗卫生领域。巴拉尔姆的父亲得了肺结核,他的两个孩子“踩着羊粪蛋进了医院”^{[9]43},在公立医院从早到晚却等不到一个医生,因为医生都去私立医院兼职了,最后他只能“躺在某个公立医院的地板上,大口大口地吐血,等待医生的到来,最终悲惨地死去”^{[9]43}。而富人猫鼬只是“有点胃痛”,就可以去到市中心的著名私人医院,在那里,“医生们穿着白大褂,口袋里装着听诊器,在医院进进出出,医院的大厅简直像五星级饭店一样干净”^{[9]160}。无论是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卫生状况,还是医生的数量、态度和专业水平,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都存在着天壤之别。虽然公立医院表面上对穷人免费开放,但实际上在这里穷人连最基本的救治都无法保障。

教育或医疗资源的不平衡在现代都市并不罕

见,但更令哈维忧心的是“不平衡地理”导致的“空间区隔”:作为一个近乎封闭的空间,贫民窟中居住的底层容易滋生仇富情绪,甚至组织针对富人的犯罪活动。面对这种情况,富人选择设置空间壁垒以阻止对方进入自己所处的空间,仇恨和恐惧在这种区隔中开始显现。这类空间壁垒的设置导致了排他性空间区隔的形成:某些空间只对富人阶层开放,穷人无法跨越特定壁垒进入此类空间,只能被驱赶到边缘的空间形态中。德里的购物中心就是这样的场所,门卫守在门口,“只有穿皮鞋的人才能进购物中心”^{[9]131}。面对穿凉鞋的人,比如司机巴尔拉姆,“门卫用棍子指着他的脚,摇了摇头,拦住了他”。富人阶级自行建构的“空间区隔”,只对穿皮鞋的人开放,这些拥有一定资产和身份的富人被认为是安全的,可以进入富人阶级专属的生活空间。因此,当巴尔拉姆故意穿上新鞋子和英文T恤进入购物中心时,门卫没有加以阻拦。表面上看,巴尔拉姆似乎是作为一个穷人成功地打破阶级壁垒进入了富人空间,实际上他只是伪装成富人阶层的一员而蒙混过关。无论是进入购物中心后时刻怕被发现的紧张,还是出门后立刻换回司机衣服的心虚,都表明巴尔拉姆并未真正跨越富人构建的用来区分和驱赶穷人的“空间区隔”。

三、全球空间非正义

随着资本主义向全球空间扩张,空间资源的集中与再分配形成了中心—边缘的空间布局。哈维指出:“某种中心—边缘格局必定会从地理扩张中诞生。”^{[17]358}空间生产在资本主义模式的推动下必定会在全球扩张和重组空间资源,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中心—半边缘—边缘地区的等级格局。这种空间关系一旦形成,便具有压迫性和剥削性的力量,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始终处于中心,而欠发达国家只能处于全球空间生产布局的边缘位置。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得到进一步拓展,由地方性的剥削走向全球性的剥削。在垄断利润的诱惑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在全球范围重新配置产业和资源的空间布局,控制欠发达国家的产业生产,获得对全球产业链的垄断性掌控,赚取超额剩余价值和垄断利润。这种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不平衡的空间布局加剧了世界范围财

富分配的两极化。班加罗尔是印度第七大城市，同时也是印度最富裕、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城市，该市IT业非常繁荣，有“亚洲硅谷”之称。然而，这里成千上万的企业家，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的企业家都经营着“班加罗尔所有的外包公司”并“支撑着美国的庞大商业帝国”^{[9]3}。阿拉文德并非想要表达美国的商业如何依靠班加罗尔的高科技企业，相反，他指出这些企业都依赖美国的商业和资本得以运转盈利。“班加罗尔的企业家们可能会这样告诉你：我的发迹是从与美国运通公司合作开始的。”^{[9]40} 巴尔拉姆的创业经历也离不开美国，“班加罗尔的男男女女……白天睡觉，晚上工作”，这是“因为它们的主人在美国”^{[9]268}。这些凌晨上班为美国公司做外包客服的姑娘们如何回家就成了巴尔拉姆瞄准的商机。说到底，班加罗尔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软件外包中心，城市中一切商业活动都和美国脱不开关系。“外包。也就是说在印度，通过电话为美国人干事。其他的一切——房地产、财富、权力、性——都源自这一行。”^{[9]268}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美国看中了班加罗尔廉价的劳动力，而班加罗尔的企业家希望以此发展自己的事业，表面上看双方各取所需，实际上班加罗尔及大部分不发达地区承包的都是发达国家计划淘汰的高污染工业或者外包客服之类的低利润行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在交换过程中获得与自身的付出相匹配的收益。印英混血作家因德拉·辛哈（Indra Sinha）曾以1984年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为原型，创作了《人们都叫我动物》（*Animal's People*）。小说中考夫波尔城的毒气泄漏伤害了城中无数百姓，康帕尼工厂的负责人却试图钻法律的漏洞，以回美国的方式逃避责任。现实世界中，类似的跨国公司作为资本全球化的产物，不惜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为发达国家牟取剩余价值。小说中这样描述外资企业大批入驻后的班加罗尔：“整个城市都笼罩在黑烟、烟雾、粉尘和水泥粉末中，被一层面纱遮挡着”，而面纱后是“一个灾难”^{[9]287}。如火如荼的短暂发展之后，留给班加罗尔这样的地区的就只有被污染的环境，更加两极分化的贫富差距和民众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新帝国主义阴霾。

印度曾被英国殖民了近200年，虽然目前已经独立了76年，其国内的民众仍然很难摆脱对帝

国主义的盲目崇拜与迷恋。正如印度流散作家基兰·德赛（Kiran Desai）斩获布克奖的小说《失落的继承》（*The Inheritance of Loss*）所揭示的，从英国归来的老法官即使年迈，身体和经济能力都大不如前，就算和孙女相依为命时，也依然要吃英式下午茶，坚持英国式的生活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曾经被殖民过的地区在独立后也很难完全摆脱殖民地的阴影。《白老虎》中，在资本全球化浪潮之下，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领域潜移默化地“殖民”着边缘地区。“温莎庄园”“白金汉塔楼”^{[9]115} 这些明显模仿欧洲建筑的公寓名称自不必提，小说中但凡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人，无论是阿肖克先生、平姬夫人还是受贿的警察局副局长的两个儿子，必定都是在美国读过书，就连巴尔拉姆最后为班加罗尔的穷孩子办的学校也是“一所英文学校”^{[9]288}。导致巴尔拉姆最后愤然杀主的导火索之一就是阿肖克先生和一名模仿美国女演员金·贝辛格的妓女发生了关系，此事发生后巴尔拉姆用所有的积蓄购买了一次和“金发”“白皮肤”^{[9]204} 的妓女发生关系的机会。这是巴尔拉姆的欲望投射，传达了他对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在他眼中的西方形象“既是先进文明的代理人，又是欲望的想象物”^[18]。可见，帝国主义殖民下的思想阴霾尚未褪去，资本全球化又使边缘地区民众的民族自卑感和对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崇拜迷恋心理卷土重来。在全球化经济高速发展的喧嚣中，受压迫者只能默默承受资本家们以“自由”之名而施加的暴力性压榨，以空间区隔为标志的贫富两极分化和文化殖民竟被不可思议地合法化了。

四、结语

印度评论家纳伊尔（C. K. Nail）认为：“乡村印度在很多方面是这个国家的灵魂。在所有可能性面前，它保留了印度的一些文明价值观。”^{[19]127} 《白老虎》中，主人公生活的小村庄原本朴实自然，充满了虔诚的宗教观念和踏实本分的劳动观念，然而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浪潮“腐蚀了”原本淳朴的农业价值观，在改变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却没有为其在城市提供生存空间。印度国内的富人通过城市化和其他经济手段剥削了穷人的空间和利益，而外国的投资者们又通过经济全

球化掠夺了大部分利润,利用欠发达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空间资源,残酷压榨欠发达地区的人民,使得这些地区原本处于上位的富人更加急切地向穷人转嫁自身受到的压迫和剥削。乡村—城市—全球层层递进的空间书写,不仅展现了阿拉文德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反思,更表达了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同情和对空间正义的呼唤。

参考文献:

- [1] GOH R B H. Narrating “dark” India in *Londonstani* and *The White Tiger*: Sustaining identity in the diaspora[J]. *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2011, 46(2): 327 - 344.
- [2] KHOR L. Can the subaltern right wrongs?: Human rights and development in Aravind Adiga’s “*The White Tiger*” [J]. *South Central Review*, 2012, 29(1/2): 41 - 67.
- [3] 姜礼福. 寓言叙事与喜剧叙事中的动物政治——《白虎》的后殖民生态思想解读 [J]. *当代外国文学*, 2010, 31(1): 89 - 95.
- [4] 黄芝. “我坦白”:《白虎》的自白叙事伦理 [J]. *当代外国文学*, 2012, 33(4): 137 - 144.
- [5] 包亚明.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 [6] 谢纳. 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空间转向视阈中的文学研究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7] WILLIAMS R.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8] 孙士海, 葛维钧. 列国志·印度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9] 阿拉文德·阿迪加. 白虎 [M]. 路旦俊, 仲文明,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 [10] SELF S, GRABOWSKI R. Modernization, inter-caste marriage, and dowry: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9, 20(1): 69 - 76.
- [11] SOMAK G. Booker for the Billion[N]. *The Telegraph*, 2008-10-23(012).
- [12] 任政. 资本、空间与正义批判——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研究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4(6): 120 - 129.
- [13] HARVEY D.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M]. London: Routledge, 2005.
- [14] HARVEY D.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5] 荣娇婷. 城市化进程与空间正义——左拉《小酒店》中的城市新移民书写 [J]. *外国文学研究*, 2023, 45(1): 141 - 151.
- [16] 大卫·哈维. 希望的空间 [M]. 胡大平,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17] HARVEY D.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M].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18] 杨晓霞, 赵洁. 想象视野:《白虎》中的异国形象与文化定位 [J]. *当代外国文学*, 2020, 41(2): 94 - 102.
- [19] NAIL C K. *Rural India in transition: A study of Kamala Markandaya’s Nectar in a Sieve*[M]//BHATMAGAR M K. *India Writings in English*. New Delhi: Atlantic Publishers and Distributors, 2000: 127 - 138.

(责编: 朱渭波)